

印度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孙昌武 天津 南开大学 教授

印度佛教输入中国，不只是传播一种新的宗教，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西学东渐”的巨大潮流，是古代中国人历时千余年、大规模地对于外来文化的吸纳，是人类文化交流史上的壮举。佛教大幅度地改变了中国面貌，特别是中国的文化与文学艺术，更是受益匪浅。有一位外国学者总括说：“佛教是印度对中国的贡献。并且，这种贡献对接受国的宗教、哲学与艺术有着如此令人震惊并能导致大发展的效果，以至渗透到中国文化的整个结构。”¹⁾ 陈寅恪有曾说：“……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金明

1) J. 勒卢瓦·戴维森《印度对中国的影响》；巴沙姆主编《印度佛教史》(A Cultural History of India, Edited by A.L.Basha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Delhi, 1984) 第669页，闵光沛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

館叢稿二編》第251頁) 概括说来, 佛教给与中国的贡献和影响主要有以下六个大的方面。

第一, 佛教向中国输入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僧团。这种具有相当规模的“方外”组织作为社会存在, 对于社会生活、思想观念、伦理道德、文化艺术等多方面的影响是十分巨大、深远的。

上世纪初英国著名印度学家查尔斯·埃里奥特说过:

佛陀的伟大实际成就, 就是建立了一个宗教团体。这个团体叫做僧团, 一直存在到今日, 其成员称为比丘。他的宗教之所以能够持久, 主要是因为有这个组织。²⁾

当代荷兰学者许理和也曾指出:

佛教不是并且也从未自称为一种“理论”, 一种对世界的阐释: 它是一种救世之道, 一朵生命之花。它传入中国不仅意味着某种宗教观念的传播, 而且是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修行团体即僧伽(saṅgha)的传入。对于中国人来说, 佛教一直是僧人的佛法。因佛寺在中国的存在所引起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和官方的态度、僧职人员的社会背景和地位, 以及修行团体与中古中国社会逐步整合(integration), 这些十分重要的社会现象在早期中国佛教的形成过程中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³⁾

2) 《印度教与佛教史纲》(Sir Charles Eliot: Hinduism and Buddhism) 第1卷第342页, 李荣熙译, 商务印书馆, 1982年。

僧团梵名saṅgha（僧伽），意译为“和合众”、“法众”等，是出家人以个体修道者身份、通过自由集合的方式而形成的特殊的社会群体。出家人“遁世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⁴⁾，度过所谓“清静梵行”即弃绝所有世俗欲望和现世利益的生活。从理论上说，僧人不受世俗王法管束，也不对团体负有任何义务，所以如谢和耐所说：“对于个人来说，出家入道是一种思想和物质上的解放。”⁵⁾僧团这种组织形式，是和中国传统上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和等级专制体制大不相同的。这是在古代被称为“方外”即世俗教化之外的团体。

在南北朝到隋唐时期，僧团规模十分庞大。据文献记载（当然是不准确、被夸大了的），北魏末年各地僧尼多达二百余万人；唐末毁佛，还俗僧尼也达二十六万人。这还不算依附寺院的大量民户，如北魏的浮图户、僧祇户和唐五代的寺户，还有大量私度僧、尼和给寺院服劳役的行者、奴婢等。看一个例子，唐代边疆地区的沙洲（敦煌），据《新唐书·地理志》开元年间户口数是四千六百户，一万四千余口，另据九世纪中期吐蕃统治时期当地寺院文书有寺院十七所，僧尼千余人，当时户口数不会距开元数字太远。宋元以后，僧、尼绝对数量减少了，但数量仍是很可观的。如此庞大的、作为专制国家体制之外特异存在的社会群体，必然造成各种社会问题（比如寺院经济膨胀对国计民生的影响），这也是历史上朝

3) 《佛教政府中国》(Erich Zürcher: 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 The Spread and Adaptation of Buddhism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第2页, 李四龙等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年。

4) 《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弘明集》卷伍,《大正藏》第52卷第30页中。

5) 《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Jacques Gernet: Les aspects économiques du Bouddhisme dans la société chinoise du Veau Xe siècle) 第199页, 耿昇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年。

廷几度采取毁佛酷烈行动的基本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如此庞大的“方外”组织，参与者相当一部分并不是佛教信仰者。下层民众很多人是因为生计无着而出家的，在战乱、饥谨年月更是如此；上层人士则往往由于人生失意、仕途不利、还有改朝换代之际不仕新朝等等原因而遁入空门。这样，僧团这种社会组织实际是提供了另一种生活出路，也是树立起另一种人生“模式”、理想社会。僧团实现一种不同于正统和世俗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人生理想。单单是这种存在本身影响就是十分巨大的。对于文学、艺术更是如此。所以佛教僧团被评价为令人惊异的“世界上的伟大力量之一”⁶⁾。

当然，从实际情形看，中国僧团不可能摆脱世俗政权的约束和管辖，它所提出的人生和伦理理想也不可能原原本本地实现，这是另外的问题。

第二，佛教向中国输入一种新的信仰。中国人接受这种具有系统教理支持、以实现普遍救济为目标的新信仰，大幅度地改变了精神面貌。

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孟德斯鸠概括中国文化的特征说：

他们把法律、宗教、风俗、礼仪都混在一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道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品德。这四者的箴规，就是所谓礼教。中国统治者就是因为严格遵守这种礼教而获得了成功。⁷⁾

中国古代传统的道德、礼教建立在朴素“天命”观基础上，“天

6) 《印度教与佛教史纲》第1卷第344页

人之际”是古代思想、学术的基本课题。“天不变道亦不变”，永恒、至高无上的天命、天道决定宇宙和人事的一切。相信天，相信命，也就缺乏个人救济意识。而佛陀不仅为修道者树立了榜样，又作为“导师”、“医王”给人指引解脱、救济的前景和道路。佛教是个人救济的宗教。特别是发展到大乘佛教阶段，随着新的佛陀观、佛土观形成，发展出更具影响力的“自利利他”菩萨救世理想，突出现世救济的直截和简易。例如后来在中国传播极广的西方净土信仰，在《阿弥陀经》里，佛说：

舍利弗，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临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⁸⁾

这是说，只要怀抱信心，无需任何其它努力，更无关任何功德，只需“执持名号”即称名念佛，临终时就可以往生无限光明、安乐的净土。当然这只是净土经典的一种说法，表现的是彰显信仰效应的极端形态。

佛教信仰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突出“自力”，即肯定个人求得救济的主观能动性，把成就佛果的根据主要归结到人的自身，而把佛陀救世济人的愿力当作辅助和保障。佛教告诉人们命运不是上天决定的，也不是自然命定的，而是个体历代轮回报应的结果。这当然

7) 《论法的精神·中国政体的特制》，何兆武等主编 《中国印象——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上册 第42页

有“宿命论”的意味。不过历代轮回只决定现状，而未来的命运则完全依靠自己，看你是否皈依三宝（佛、法、僧），发菩提心（无上证等正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认真地“诸恶莫做，诸善奉行”，等等。而且，无论修行还是得果，又都是不问品级高下、贫富贵贱的。这和中国传统的等级人性论也是全然不同的。佛经（《阿闍世王授决经》、《贤愚经·贫女难陀品》等）里有个贫女一灯故事，说阿闍世王请佛，燃灯供养，具百斛麻油膏大量燃灯，自佛陀所在的祇洹精舍一直陈列到宫门口；而有一贫女乞得二钱，点燃一灯，其炽盛却超过国王的千百灯。像这样的故事，必然会给贫苦无告的百姓以无限鼓舞，启发和坚定了无数人的归依心和信仰心。

由于佛教强调个人救济，从而给中国人灌输了敬畏心（比如畏惧轮回报应之苦）、忏悔心（佛教把忏悔当作解脱罪责的重要手段）、感恩心（比如感激佛陀的慈悲加护）、慈悲心（拔众生苦、与众生乐是菩萨的根本精神）等等，这是所谓“宗教情怀”。这都从一定意义上提升了人们的精神品质，丰富了人们的精神境界。而且，在佛教宣扬的对于个人救济的信仰的背后，不仅体现了民众解脱苦难的渴望，更鼓舞起他们对于自身能力和前途的信心。从更高的理论层面说，正是这种强调个人精进努力以改变命运的观念，启发宋儒发展出强调个人修身养性、道德自我完善的理念。

第三，佛教作为宗教，以其丰厚的思想、理论内容见长，其教理、教义包含丰富、复杂而细致的哲理和极其严密的逻辑论证。所以关于佛教有“智信而非迷信”之说。佛教这种注重学理的特征在中土注重理性的传统中更得到发挥，佛教多方面地推动了中国思

8) 《佛说阿弥陀经》，《大正藏》第12卷第347页中

想、学术的发展。如陈寅恪所指出：“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鉅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⁹⁾

中国人以弘通的态度相当全面地传译了印度佛教大小乘、各部派、各学派典籍。中国僧俗在自身发达的理论思想基础上对外来佛教思想进行批判、分析，形成发达的义学，最终建设起中国佛教的学派和宗派，培养出一代代卓越的佛教思想家。在魏晋以后直到唐五代这几百年间，中国思想史上做出重大建树、取得重大成就的思想家几乎都是出身佛教的。相对于中国传统上注重政治、伦理的社会思想，佛教在宇宙观、人性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人生观等诸多领域所提出的思想、观念、理论，见解深刻，体系严整，逻辑论证严密，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极大地发展和充实了中国的思想。佛学更成为宋儒构造“新儒学”的主要理论依据，而“新儒学”的形成乃是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一大转变。

东晋以后，重要大乘经论如《般若经》、《法华经》、《维摩经》、《涅槃经》和《大智度论》、《中论》、《成唯识论》等已成为文人教养的必读书。佛教典籍向中国文人展现了全新的境界。如上所述，中国知识界接受的传统儒学教育注重政治、伦理范畴，是“方内”的思想和学问。而佛典展现的，宏观上有宇宙之大，历劫之久；微观上是蚊子之小，“种子”（意识）之微，无论是三世十方、佛国净土，还是天龙八部、罗汉菩萨，这丰富多彩、光怪陆离的幻想世界，对困于儒家繁琐章句的人们是一种思想上的解放。这种解放进一步成为许多人发挥思想、文化创造的推动力。

9)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策審查報告》，《金明館叢稿二編》第25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至于佛教对于一些具体学术领域如在哲学、伦理学、心理学、史学、语言学、逻辑学（因明）、地理学、美学、翻译学、中外文化交流史以及众多的自然科学（例如天文历算、医药学）等众多学科的贡献和影响，这里无烦赘述了。

第四，佛教教理、教义里包含丰富的伦理内容，具有重大的普世价值。佛教丰富和补充了中国伦理原则与内容，这也是佛教在中土受到欢迎并得以扎根和发展的的重要依据。

近代德国神学家、思想家施韦策（Albert Schweitzer）论及中国人为什么会接受佛教时则指出：

首先，这当然是大乘佛教的热情伦理赢得了中国人的同情……佛教那种慈悲伦理的崇高与内在性使他们陶醉了。¹⁰⁾

佛教伦理自有其消极方面，比如主张轮回报应，带有浓厚“宿命论”色彩；宣扬“忍辱”，不抵抗“恶”，也显得过于消极；对人生取虚无立场，要求离俗、出家，不合中国传统孝道，等等。但佛教的“终极关怀”虽然要人“出世”，伦理上却多方面地体现了积极入世精神。特别是发展到大乘佛教阶段，这种精神更得到发挥。例如佛教是在与婆罗门教的对抗、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婆罗门教实行黑暗、落后的种姓等级压迫制度。佛教当然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取消压迫和剥削，但“空观”的异名之一就是“平等观”；大乘佛教明确主张“自证无上道，大乘平等法”¹¹⁾，认为众生在业报轮回的规律面前平等，接受济度的机会和可能平等，证得正觉没有高下贵贱之别而平等，等等。这是相当彻底的平等观念，传入中土即成为思想领域“平等”理论的宝贵资源。“是法平等，

无有高下”曾成为动员民众反抗阶级压迫的口号。佛教的人性平等观念，乃是人类人性理论上的重大进展。它更体现为对于一切“有情”慈悲为怀、关心与尊重，乃是伦理史上十分富于人情味、具有实践价值的思想，

中国佛教伦理突出发扬了大乘佛教重现世、重人生的精神，实行“诸恶莫作，诸善奉行”，“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特别是慈悲、平等、施舍、护生、维护和平、反对战争等观念，被贯彻到实践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历代佛教信徒救死扶伤，救荒济贫，修桥造路，救济鳏寡孤独，创办社会救济机构，等等，中国历代社会救济事业中，佛教往往是创始者或主要力量。这样，佛教伦理无论作为观念还是实践都是具有重大价值的，在文化艺术中更有普遍而深入的表现。

第五，佛教有力地推进和丰富了中国的工艺、艺术、文学等领域的发展。在佛教滋养下，这些领域取得了诸多重大成果，积累下宝贵遗产。

法国学者里奈·格鲁塞特称佛教为“东亚无与伦比的虔诚的和人格性的宗教”，并说这种教义“通过佛教艺术本身，它们赢得了民众的情感”¹²⁾。这就把佛教文学艺术看作是其得以征服群众的主要凭借之一。

佛教是外来文化的载体。中国佛教艺术，如石窟、塔寺等建筑，佛教雕塑、造像、绘画、书法等，这些中国艺术史上的卓越成就，都有佛教带来的外来“粉本”。中国以佛教为津梁所吸取的，不只

10) 《印度思想及其发展》，译文见何兆武等主编《中国印象——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上册第259页

11) 《妙法莲华经》卷一《方便品》

是印度和中亚的，还有远至伊朗、希腊的艺术成果。历代艺术家和工匠们在积极地汲取外来滋养的同时，更在本民族传统基础上推出新、多所创造，形成中国佛教艺术的民族规范和体式。

佛教在文学创作领域取得的成绩就是十分巨大的。汉译佛典里的文学（或富于文学情趣的）作品被称为“佛典翻译文学”，具有重大价值，对世俗文学产生多方面的影响。两晋之后，历代文人普遍地结交僧侣、研读佛书、游赏塔寺成为习俗，佛教广泛而深入地影响文人的思想、生活和创作。特别是在经学居于统治地位的环境中，佛教提供了突破这种思想网罗的途径和手段。结果历代文学创作里许多新颖的思想，新鲜的创意往往和佛教影响有关系，佛教更在体裁、主题、题材、“人物”、情节、语言、表现技巧和手法等众多领域为世俗文学提供了丰富而广泛的借鉴。晋宋以后历代优秀作家大都与佛教有瓜葛，如谢灵运、沈约、王维、杜甫、白居易、柳宗元、苏轼、王安石、黄庭坚、李贽、龚自珍，谭嗣同等，都是典型例子。

最后第六点，也是意义十分重大的一点，即从更广阔地角度看，佛教乃是历史上中华民族各民族间团结与融合的津梁、促进了统一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巩固和发展，也是中外各国、各民族间睦邻友好关系的纽带。

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经过长期的融合过程形成的。在这长远过程中，佛教起了积极推进作用。中国幅员广大，各地区发展不平衡，这广大领域内部的南北、东西的文化交流对于巩固国家

12) 《中华帝国的崛起》第11章《佛教的启迪》，译文见何兆武等主编《中国印象——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上册第95页

统一十分重要，佛教对于国家内部的交流同样也起着重要作用。以上两方面作用，在国家处在分立政权存在或分裂割据状态下显得更为突出。

中国佛教步入兴盛，是在东晋十六国时期。西晋灭亡，“五马渡江”，北方陷入所谓“五胡十六国”的少数民族割据与纷争状态。匈奴、羯、鲜卑、氐、羌这些原本是活跃在北部边疆的游牧民族，依靠劫掠征战南下，建立政权。他们南下中原后，接触到佛教，认为“佛土戎神，正所应奉”¹³⁾，对于佛教怀抱一种亲切感。他们接受佛教，实际是接受中原先进文化的重要步骤，有力地提高了他们的文化水平，更有助于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统一、繁荣的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极其兴盛的时期，也是与内各民族和国际间交流十分发达的时期。佛教在交流中起着重要作用。玄奘西行求法，向西域各国和印度宣扬大唐声威、介绍中华文化，是历史上著名的事件。唐王朝与周边诸族，如东北的渤海、北方的回纥、西南的吐蕃的交流，这些地区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汉传佛教，佛教成为双方交往的纽带。特别是藏族，公元七世纪中叶传入佛教，在民族土壤上形成藏传佛教，成为佛教三大系统之一。七世纪中，松赞干布赞普迎娶文成公主，输入汉传佛教，进一步推动了佛教发展，也密切了与中原的关系。以后汉、藏两大系佛教交往不绝，相互影响都很巨大。另一个历史时期是宋元时期。建立辽国的契丹族在其发祥伊始，就着意吸收南方汉族先进文化，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佛教。至辽太宗会同元年（937）夺取燕云十六州，正是佛教盛行的地方，更促进朝野佛教信仰的兴盛。建立金国的女真族则在开国以前已从高

13) 《高僧傳》卷九《晉鄴中竺佛圖澄傳》，第372頁

丽、渤海国输入佛教。后来南下灭辽，完全继承了辽国崇佛之风；占领汴京之后，又受到宋代佛教的影响。蒙古族在成吉思汗征战时期，佛教已经传入。成吉思汗对于传来的各宗教给予平等待遇，表现出宏阔的胸襟。世祖忽必烈即位以前，已约请西藏名僧帕思八东来，并拜为帝师，命其掌管全国佛教。元朝初年西藏终于并入祖国版图，也正得力于萨迦派的活动。在另一个由满族建立统治全国政权的清王朝，佛教在民族融和与团结中同样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清王朝全面接受并支持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喇嘛教），有意识地利用它们作为团结、教化各族的手段。

中国佛教更成为与周边国家和民族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成为与周边各国和各民族结成友好关系的重要纽带。中国佛教在三韩、日本、越南流传、扎根，特别对于所谓“汉语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起着极其重大的作用，直到今天佛教仍然是促进各国、各民族友好、和平、互利、合作的重要力量。

这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佛教大幅度地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印度与中国两个伟大的文化传统的交流与结合结成中国佛教这一灿烂果实，印度佛教文化更成功地融入到中国文化之中，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段悠久的历史交流史留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启发与联想，经验与借鉴。而这些也是¹⁴⁾佛教文化现代意义的主要所在。

인도불교가 중국 문화에 끼친 영향

손창무 천진 남개대학 교수¹⁵⁾ | 번역 정선주 중앙승가대학교

인도 불교가 중국에 유입된 것은 단지 하나의 새로운 종교가 전파된 것일 뿐만 아니라 중국 역사상 처음으로 “서양 학문이 중국으로 들어 오는” 거대 조류이며, 고대 중국인이 거쳐 온 천여 년의 세월동안 대 규모로 외래문화를 받아들인 인류문화 교류사의 쾌거라 할 수 있겠다. 불교는 중국의 면모를 대폭적으로 변화시켰는데 특히 중국 문화와 예술에서 더욱 많은 영향을 받았다. 한 외국 학자는 “불교는 인도

15) 천진 남개대학(南开大学) 중국어언문학과에서 교수로 재직 중이다. 한국의 영남대학교와 일본의 고베대학에서 객원 교수를 역임했고, 일본 교토대학 인문과학연구소의 외국인 연구원을 지냈다.

주 전공은 수당오대(隋唐五代) 문학과 불교 문학이며, 대표 저서로는 《유원종전론(柳宗元传论)》, 《당대고문운동통론(唐代古文运动通论)》 등이 있고, 불교 관련 저서로는 《불교와 중국문학(佛教与中国文学)》, 《중국불교문화서설(中国佛教文化序说)》, 《중국문학 중의 유마와 관음(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 《선사와 시정(禅思与诗情)》, 《불교문학지식 해설과 독해(佛教文学知识讲解与阅读)》, 《한역불전번역문학선(汉译佛典翻译文学选)》, 《중국불교문화사(中国佛教文化史)》, 《불교문학십강(佛教文学十讲)》과 《북방민족과 불교 : 문화교류와 융합(北方民族与佛教 : 文化交流与融合)》 등이 있다.

의 중국에 대한 공헌이다. 또한 이러한 공헌은 받아들이는 국가의 종교, 철학과 예술에서 사람들에게 놀라움을 안겨 주고 또한 큰 발전의 효과를 가져왔으며, 중국 문화의 전 체계에 스며들었다.”라고 하였다.¹⁶⁾ 진인각(陳寅恪)은 “...이천년 이래 화하민족은 儒家 학설의 영향을 받았는데, 실제 法律制度, 公私生活의 방면과 학설 사상 방면에서 가장 깊고 큰 영향을 받은 것은, 어쩌면 오히려 불교와 도교 두 종교만 하지 못하다.”라고 하였다.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 《金明館叢稿二編》第251頁) 요약하여 말하자면 불교가 중국에 끼친 공헌과 영향은 다음과 같이 여섯 가지를 들 수 있다.

첫째, 불교는 중국에 ‘승단(僧團)’이라는 하나의 사회 조직을 가져왔다. 이러한 상당한 규모를 갖춘 ‘방외(方外)’ 조직이 사회에 존재하게 됐는데, 사회생활, 사상관념, 논리도덕, 문화예술 등 다방면에 대단히 거대하고 광범위한 영향을 끼쳤다.

지난 세기 초 영국의 저명한 인도학자 Charles Eliot은 다음과 같은 말을 하였다.

붓다의 위대한 실제 업적은 바로 하나의 종교 집단을 설립한 것이다. 이 집단을 승단이라고 부르는데 지금까지 존재하며 그 구성원을 비구라 한다. 그 종교가 유지되어온 주요 원인은 바로 이 조직이 존재했기 때문이다.¹⁷⁾

당대 네덜란드 학자 Eric Zürcher 역시 다음과 같은 말을 하였다.

16) J. 勒卢瓦·戴维森《印度对中国的影响》；巴沙姆主编《印度佛教史》(A Cultural History of India, Edited by A.L.Basha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Delhi, 1984) 第669页, 闵光沛等译, 商务印书馆, 1997年.

17) 《印度教与佛教史纲》(Sir Charles Eliot: Hinduism and Buddhism) 第1卷第342页, 李荣熙译, 商务印书馆, 1982年.

불교는 스스로 일종의 “이론”이라 칭하지 않았으며, 일종의 세계에 대한 이해이며, 구세(救世)의 도(道)이고 한 송이 생명의 꽃이다. 불교가 중국에 들어오는 것은 단지 종교 관념의 수용만 뜻하는 것이 아니며, 일종의 사회 조직 체계(수행단체, 즉 승가)의 수용이기도 하다. 중국인의 입장에서 보면 불교는 줄곧 승려들의 불법이었다. 사찰이 중국에 존재하면서 일어나는 작용과 반작용, 지식인(인텔리)과 정부의 태도, 승려들의 사회적 배경과 지위 그리고 수행 단체와 봉건 중국 사회가 점차 융합되어가면서 이러한 매우 중요한 사회적 현상이 초기 중국 불교의 형성 과정에서 결정적 역할을 하였다.¹⁸⁾

승단의 범어 명칭은 saṅgha 승가(僧伽), 의역하자면 화합중(和合衆), 법중(法衆) 등이라 하며, 출가자가 각자 수행자의 신분으로 자율적으로 모여 형성된 특수한 사회단체이다. 출가인은 “속세를 떠나 그 뜻을 구하고, 속세를 변화시켜 그 도에 이른다.”¹⁹⁾라고 하며, 세속의 욕망과 현세의 이익을 추구하는 생활을 버리고 청정범행(淸淨梵行)을 행한다. 이론적으로 말하자면 승려는 세속의 통제를 받지 않고 단체의 어떠한 의무도 없다. 그래서 Jacques Gernet(프랑스 학자)은 “개인의 입장에서 보자면 출가하여 입도하는 것은 일종의 사상과 물질에 있어서의 해방이다.”라고 말했다.²⁰⁾ 승단 조직의 체계는 중국의 전통적인 혈연으로 맺어진 宗法 制度와 等級 專制 體制와는 크게 다르다. 이것은 고대에 ‘방외(方外)’라고 불리는 즉, 세속에 교화된 단체에서 제외된 단체이다.

18) 《佛教政府中国》(Erich Zürcher: 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 The Spread and Adaptation of Buddhism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第2页, 李四龙等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年.

19) 《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 《弘明集》卷伍, 《大正藏》第52卷第30页中.

20) 《中國5-10世紀的寺院經濟》(Jacques Gernet: Les aspect économiques du Bouddhisme dans la société chinoise du Veau Xe siècle) 第199頁, 耿昇譯,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年.

남북조에서 수당에 이르는 시기까지 승단의 규모는 매우 거대했다. 문헌에 기재된 것을 근거로(당연히 정확하지 않고 과장되었다.) 북위 말년 각지의 승려들은 이백여 만 명에 달하였으며 당 말 혜불(毀佛) 당시에는 환속하는 승려 수 역시 이십육만 명에 달하였다. 이것은 아직 사원에 의지한 다수의 민호를 포함하지 않은 것으로 북위의 부도호(浮圖戶), 승지호(僧祇戶)와 당 오대의 사호(寺戶), 그리고 다수의 사도승, 니(私度僧, 尼)와 사원에서 노역하는 행자와 노비 등이 있다. 예를 들면, 당나라 때 국경 지역의 사주(沙洲, 둔황(敦煌))는 〈新唐書·地理志〉에 의하면 개원 연간에 호구 수는 사천육백 여 가구이며, 일만 사천여 명이다. 다른 9세기 중엽 吐蕃 통치 시기 현지 사원문서에 의하면 사원 17개와 승려 천여 명이며 당시 호구 수가 개원 연간의 수와 크게 차이가 나지 않는다. 송원 이후 승려의 수는 절대적으로 감소하였지만 그러나 여전히 대단했다. 이와 같이 거대하고, 전체 국가 체제 밖에서의 특이한 존재의 사회단체는 필연적으로 각종 사회 문제를 만들어냈으며 (예를 들면 사원 경제의 팽창이 국가 경제와 국민 생활에 미치는 영향), 이것은 조정에서 몇 항의 가혹한 혜불 정책을 채택하는 원인이 되었다.

주목해야 할 점은 이러한 거대한 ‘방외(方外)’조직은 참여자의 상당 부분이 불교 신자가 아니라는 것이다. 하류층의 많은 사람들이 생계를 위하여 출가를 하였고, 전쟁이나 기근 때에는 더욱더 그러했다. 상류층의 사람들은 종종 인생에서 실의를 하거나, 벼슬길이 순조롭지 못할 때, 또는 정권이 바뀌면서 새 정부에서 관직을 얻지 못하는 등등의 이유로 출가를 한다. 이렇듯 승단과 같은 사회조직은 사실상 또 다른 생활의 출구를 제공하고, 또 다른 인생의 유형과 이상사회를 수립한다. 승단은 일종의 다른 正統과 세속의 사상관념, 가치관념, 생

활방식, 인생의 이상을 실현한다. 오직 이러한 존재 자체의 영향력이 매우 거대하다고 할 수 있다. 문학과 예술에서는 더욱 그러하다. 그래서 불교의 승단은 사람을 놀라게 할 정도의 “세계상의 위대한 세력 중 하나이다.”²¹⁾라는 평가를 받는다.

물론 실제 정황을 살펴보면, 중국 승단은 세속 정권의 구속과 관할을 떨쳐버리지 못했고, 제시했던 인생과 논리적 이상 역시 원래대로 실현하지 못하였는데, 이것은 다른 문제이다.

둘째, 불교는 중국에 일종의 새로운 신앙으로 받아들여졌다. 중국인들은 이러한 체계적인 교리를 갖추고 보편적인 구제 실현을 목표로 하는 새로운 신앙을 받아들였으며, 정신적인 면모를 대폭적으로 변화시켰다.

프랑스 계몽주의 사상가 Montesquieu는 중국문화의 특징에 대해 다음과 같이 말하였다.

그들은 법률, 종교, 풍속, 예의가 모두 한 데 섞여있다. 이러한 모든 것들을 도덕이라 한다. 이러한 모든 것들을 品德이라 한다. 이러한 네 가지 잠규(箴規)를 곧 예법이라 부른다. 중국의 통치자는 이러한 예법을 엄격히 지키므로 성공을 얻는다.²²⁾

중국 고대의 전통 도덕, 예법은 소박한 “천명(天命)”관을 토대로, “천인지제(天人之際)”의 고대 사상과 학술적 기본과제로부터 확립되었다. “하늘이 변하지 않으면 도 역시 변하지 않는다(天不變道亦

21) 《印度教与佛教史纲》第1卷第344页

22) 《论法的精神·中国政体的特制》，何兆武等主编 《中国印象——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上册 第42頁

不變)”, 영원한 지고지상의 천명(天命), 천도(天道)가 우주와 인간사 일체를 결정한다. 천명을 믿는 것은 바로 개인의 구제 의식이 부족하다는 것이다. 그러나 붓다는 수행자를 모범으로 세울 뿐만 아니라 “도사(導師)”와 “의왕(醫王)”으로 삼아 인간에게 해탈과 구제의 전망과 길을 인도하는 것이다. 불교는 개인 구제의 종교이다. 특히 대승 불교의 단계로 발전해가고, 새로운 붓다관과 불토크관이 형성됨에 따라 더 많은 영향력을 갖춘 “자리이타(自利利他)”의 보살이 구제하는 이상으로 발전해갔고, 간단명료하게 현세를 구제하는 것이다. 예를 들어 후에 중국에 西方淨土 신앙이 전파되었고, 〈아미타경〉에는 다음과 같은 내용이 있다.

사리불아, 조그마한 선근, 복덕, 인연으로는 저 나라에 태어나지 못하느니라. 사리불아, 만약에 선남자와 선여인이 아미타불이 이르는 것을 듣고 이름을 불러서 하루이거나 이틀이거나 사흘이거나 나흘이거나 닷새이거나 열새이거나 이레이거나 한결같은 마음으로 흔들리지 아니하면, 그 사람이 누구든 장차 죽을 때 마음이 흐트러지지 아니하여 즉시 아미타불의 극락국토에 가서 태어날 것이다.²³⁾

이것은 신심을 가지고 어떠한 다른 노력이나 공덕 없이 염불이라 하는 “집지명호(執持名號)”를 한다면 임종 시에 무한광명하고 안락한 정토에 이를 것이라는 내용이다. 물론 이것은 정토경전의 하나의 논리이며, 신앙의 효과를 분명하게 표현하려는 극단적인 형태라고 할 수 있다.

23) 《佛說阿彌陀經》, 《大正藏》第12卷第347頁中

불교신앙의 중요한 특징으로 “자력(自力)”을 들 수 있는데, 개인이 바라는 구제의 주관적인 능동성을 인정하고, 불과(佛果)를 이루는 근거를 자기 자신에게 두고 있으며, 붓다의 세상을 구하고 사람을 구하는 원력을 보조하는 것으로 보고 있다. 불교는 사람들에게 운명은 하늘이 정하거나 자연이 정한 것이 아니라 개인이 오랜 세월 거쳐 輪回應報한 결과라 가르치고 있다. 이것은 물론 “숙명론(宿命論)”의 뜻이다. 그러나 역대로 윤회는 현상만을 결정할 뿐이지 미래의 운명은 완전히 자신에 달린 것이며, 삼보에 귀의를 했는지, 보리심(無上正等正覺,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을 냈는지, 진실로 “모든 악을 행하지 않고, 모든 선을 행하였는지” 등등을 본다. 게다가 수행을 하거나 불과(佛果)를 얻을 때는 계급의 높고 낮음이나, 빈부나 귀천을 묻지 않는다. 이것은 중국 전통의 등급을 나누는 인성론(人性論)과는 전혀 다르다. 불경(〈阿闍世王授決經〉, 〈賢愚經·貧女難陀品〉 등)에 가난한 여자의 등불에 관한 이야기가 나온다. 아사세왕의 청불(請佛) 이야기를 하자면, 등불을 공양하려고 많은 양의 기름이 기원정사(祇園精舍)에서 궁 문 앞까지 줄 지어 켜 있었다. 그러나 한 가난한 여인이 동전 두 푼을 가지고 전등 하나를 붙였는데 그 등이 오히려 국왕의 수많은 등보다 빛났다. 이러한 이야기들은 빈곤하고 괴로운 백성들을 한 없이 격려하였으며, 무수히 많은 사람에게 귀의심과 신앙심을 확고히 할 수 있었다.

불교는 개인의 구제를 강조하므로 중국인들에게 경외심(敬畏心, 輪回應報의 고통을 두려워하는 것), 참회심(懺悔心, 불교가 참회를 해탈과 죄책의 중요 수단으로 삼는 것), 감은심(感恩心, 붓다의 자비와 가호에 감격해 하는 것), 자비심(慈悲心, 중생의 고통과 기쁨이 보살의 근본정신이라는 것) 등등을 주입시키고, 이것을 “종교정회(宗

教情懷)”라 한다. 이것은 인간의 품격을 향상시키고 정신이 풍부해지는데 일정한 의의가 있다. 게다가 불교가 널리 알리는 개인 구제 신앙의 배후는, 민중의 해탈 고난의 갈망을 구현할 뿐만 아니라, 그들 자신의 능력과 미래에 대한 신심을 더욱 북돋아 준다고 할 수 있다. 더 높은 이론 측면에서 말하자면, 바로 이렇게 개인이 노력하여 운명을 바꾸는 관념은 송 나라 유학에서 개인의 수양과 도덕적인 자아를 완벽하게 하는 이념을 강조하는 것으로 발전해 왔다.

셋째, 불교는 종교로서 풍부한 사상과 뛰어난 이론의 내용을 가지며, 교리와 교의는 복잡하고 세세한 철학의 이치와 매우 치밀한 논리적 논증을 포함하고 있다. 그래서 불교에는 “지신이비미신(智信而非迷信)”이라는 말이 있다. 불교가 이렇게 학리를 중시하는 특징은 중국에서 이성을 중시하는 전통 가운데 더욱 발휘되었으며, 불교는 다방면에서 중국의 사상과 학술적 발전을 촉진하였다. 진인각(陳寅恪)은 “...이천년 이래 화하민족은 儒家 학설의 영향을 받았는데, 실제 法律制度, 公私生活의 방면과 학설 사상 방면에서 가장 깊고 큰 영향을 받은 것은 어쩌면 오히려 불교와 도교 두 종교만 하지 못하다.”라고 하였다.²⁴⁾

중국인들은 열린 태도로써, 인도 불교의 대·소승, 각 부파와 학파의 서적을 번역해왔다. 중국의 승속(僧俗)은 자신의 발달된 이론 사상을 토대로 외래 불교 사상을 비판하고 분석하여 발달된 의숙(義塾)을 형성하였고, 마침내 중국 불교의 학파와 종파를 설립하였으며, 탁월한 불교사상가를 양성해냈다. 위진(魏晉) 이후부터 당오대(唐伍

24)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策審查報告》, 《金明館叢稿二編》第250頁,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年

代)에 이르는 수 백 년 간, 중국 사상사에서 중대한 공로를 세우고 중대한 성취를 얻은 사상가는 거의 모두 불교에서 나왔다. 중국 전통은 상대적으로 정치, 이론의 사회적 사상을 중시하는데, 불교는 우주관, 인성론, 인식론, 방법론과 인생론 등의 많은 학문에서 사상, 관념, 이론, 핵심적 견해, 완전한 체계, 엄밀한 논리적 논증의 중대한 이론 가치와 실천 의의를 가지고, 중국의 사상을 극대화하여 발전하고 강화시켰다. 불교는 다시 송나라 유학이 형성되는데 “신유학(新儒學)”의 이론의 주요한 근거가 됐으며, “신유학(新儒學)”의 형성은 중국 사상 문학 영역에서 일대 전환이 되었다.

동진(東晉) 이후, 중요한 大乘經論인 <반야경(般若經)>, <법화경(法華經)>, <유마경(維摩經)>, <열반경(涅槃經)>과 <대지도론(大智度論)>, <중론(中論)>, <성유식론(成唯識論)> 등은 이미 문인의 교양 필독서가 되었다. 불교 경전은 중국 문인들이 새로운 경지로 나아갈 수 있게 하였다. 앞서 말한 바와 같이 중국의 지식층이 수용한 전통 유교 교육은 정치, 이론 범주를 중시하는 “방내(方內)” 사상과 학문이다. 그러나 불교의 발전은 거시적으로 우주의 거대함과 세월의 유구함. 미시적으로는 개미의 작음과 종자(意識)의 미세함, 삼세十方(三世十方)과 불국정토(佛國淨土), 천룡팔부(天龍八部)와 나한보살(羅漢菩薩), 이렇게 다채롭고 기이한 환상의 세계는 자질구레하고 번잡한 유학자들의 해석에 지친 사람들에게 일종의 사상적 해방이 되었다. 이러한 해방감이 진일보하여 수많은 사람들이 사상과 문화를 창조하는 추진력을 발휘하게 되었다.

불교가 몇몇 철학, 논리학, 심리학, 사학, 언어학, LOGIC학(因明, 梵 hetu-vidyā), 지리학, 미학, 번역학, 중외문화 교류사와 각종 자연과학(예를 들어 천문역산학, 의약학) 등 많은 전공에 공헌과 영향을 미

쳤는데, 여기서 장황하게 늘어놓지 않겠다.

넷째, 불교 교리와 교의 속 내포된 풍부한 논리적인 내용은 중대한 보세(普世) 가치를 지니고 있다. 불교는 중국적 논리의 원칙과 내용을 풍부하게 하고 보완하며, 이것은 중국에서 환영을 받고 뿌리를 내리며 발전하게 된 중요한 근거가 된다.

근대 독일의 신학가이자 사상가인 Schwetzer는 중국인들이 왜 불교를 수용했는가에 대해 논하면서 다음과 같이 말하였다.

우선 이것은 물론 대승불교의 열정적인 논리가 중국인의 공감을 얻었기 때문이다. …불교의 그러한 자비적인 논리의 숭고함과 내재성은 사람들로 하여금 빠져들게 하였다.²⁵⁾

불교의 논리는 본래 소극적인 면이 있는데, 예를 들어 輪回應報를 주장하지만 “宿命論”의 색채가 짙다. “惡”에 저항하지 말고 “忍辱” 하라고 하여, 지나치게 소극적인 면이 드러나기도 하며. 세속을 떠나 출가하기를 바라는 것이 중국 전통 효도 사상에도 부합하지 않는다. 다만 불교에서 “중극관회(終極關懷)”는 비록 사람이 죽더라도 논리적으로는 오히려 여러모로 적극적인 입세정신(入世精神)을 실현하는 것이다. 특히 대승불교로 발전하는 단계에서 이러한 정신은 더욱 더 발휘되었다. 예컨대 불교는 브라만교와의 대항과 투쟁 중 형성되고 발전해왔다. 브라만교는 부패하고 낙후된 카스트 제도를 실시하였다. 불교는 물론 근본적으로 억압과 착취를 부정하거나 없앨 수는

25) 《印度思想及其发展》, 译文见何兆武等主编《中国印象——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上册第259页

없지만, “공관(空觀)”의 다른 이름은 바로 “평등관(平等觀)”이다.(대승불교는 “自證無上道, 大乘平等法”²⁶⁾라고 명확하게 주장하였는데, 대중이 업보와 윤회의 규율 앞에서는 평등하고 제도의 기회와 가능성을 얻는 것에 평등하고, 正覺을 구하는데 고하 귀천의 차별 없이 평등하다는 것 등등이다.) 이것은 상당히 철저한 평등 관념이며 중국에 들어와 이미 사상 영역에서 “평등”이론의 귀한 자원이 되었다. “是法平等, 無有高下”는 민중을 동원하여 카스트 제도에 저항하는 구호가 되었다. 불교의 인생평등 관념은 인류의 인성 이론상의 중대한 진전이다. 그것은 일체 “有情”에 자비를 품고 관심과 존중을 보이면, 이에 논리적으로 매우 인정미가 넘치며 실천 가치의 사상을 가지게 된다.

중국불교의 논리는 대승불교에서 현세를 중시하고, 인생의 정신을 중시하는 것이 돋보였고, “諸惡莫作, 諸善舉行”과 “莊嚴國土, 利樂有情”을 실행하게 하였다. 특히 慈悲, 平等, 施舍, 護生, 평화유지와 전쟁에 반대하는 등의 관념을 철저히 실행에 옮기는 가운데 적극적으로 영향력을 발휘했다. 역대로 불교 신도들은 죽음에 처한 사람을 구하고 부상자를 도우며, 기근을 구제하고 가난한 이를 구하며 도로와 다리를 개수하고 고독한 과부와 홀아비를 구제하고 사회 구제 기구를 만드는 등 중국 역대 사회구제 사업에서 불교는 창단 혹은 조력의 역할을 하였다. 이렇게 불교의 논리는 관념이던 실천이던 모두 중대한 가치를 갖고 있으며, 문화 예술 중에서도 넓고 깊게 표현되어 있다.

다섯째, 불교는 중국의 공예, 예술, 문학 등의 분야에서의 발전을 강력하게 추진하고 있다. 불교의 지원 아래 이러한 분야들은 대단히

26) 《妙法蓮華經》卷一《方便品》

중대한 성취를 얻었고, 진귀한 유산을 남겼다.

프랑스 학자 Rene Grousset는 불교에 대해 “동남아와 비교도 안되게 경건하고 인격적인 종교이다. 또한 이러한 교의는 “불교예술 그 자체를 통해 민중의 정감을 얻었다”²⁷⁾라고 말하였다. 이것은 불교 문학예술이 민중을 정복하는 주요 기반 중 하나라 볼 수 있다.

불교는 외래문화의 운반체이다. 중국 불교 예술은 예를 들어 석굴, 절 등의 건축과 불교 조소, 회화와 서예 등 중국 예술사상 뛰어난 성취를 달성했으며, 모두 불교가 들여온 외래문화의 바탕을 가지고 있다. 중국은 불교를 매개체로 인도와 중앙아시아 뿐 아니라 이란과 그리스의 예술의 성과마저 받아들였다. 역대 예술가와 장인들은 외래 문화를 적극적으로 받아들이는 동시에 본래 민족의 기초를 토대로, 좋은 것을 받아들여 새로운 것을 창조해냈으며 중국 불교의 민족 규범과 형식을 만들어나갔다.

불교는 문학 창작의 영역에서도 매우 큰 성취를 이루었다. 漢譯佛典 속의 문학(혹은 문학 정취가 풍부한)작품은 “불전번역문학(佛典翻譯文學)”이라 불리며 중대한 가치를 지니고 있고, 세속의 문학이 발생하는데 다방면에 영향을 끼쳤다. 兩晉 이후 문인들이 승려들과 교류하거나 불서를 연구하고 사찰 답사를 하는 것이 관습이 되어서, 불교는 문인들의 사상, 생활과 창작에 광범위하고 깊은 영향을 미치게 되었다. 특히 경학(經學)이 통치하는 위치에 있는 환경에서 이러한 사상 로직의 절차와 수단을 타파하도록 해주었다. 결과적으로 역대 문학 창작 중 참신한 사상과 신선한 창의는 왕왕 불교의 영향과 관

27) 《中华帝国的崛起》第11章《佛教的启迪》，译文见何兆武等主编《中国印象——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上册第95页

계가 있으며, 불교는 더욱이 장르, 주제, 제재, 인물, 정서, 언어, 표현 기법과 수법 등 많은 영역에서 세속 문학에 풍부하고 광범위한 소스를 제공해주었다. 晉宋 이후 역대 우수 작가의 대부분은 불교와 관계가 있는데, 사령운(謝靈運), 심약(沈約), 왕유(王維), 두보(杜甫), 백거이(白居易), 유종원(柳宗元), 소식(蘇軾), 왕안석(王安石), 황정건(黃庭堅), 이지(李贄), 공자진(龔自珍), 담사동(譚嗣同) 등이 모두 전형적인 예이다.

마지막 여섯째, 역시 매우 중대한 의의 중 하나인데, 넓은 시각으로 보면 불교는 역사상 중화민족의 각 민족 간 단결과 융합의 연결체이며, 통일된 중화민족문화를 공고히하고 발전을 촉진시켰으며, 또한 외국 각국과 각 민족 간의 선린 우호 관계의 매개체가 되었다. 중국은 다민족 국가이며 중화민족은 장기간의 융화 과정을 거쳐 형성되었고, 이 과정에서 불교는 적극적으로 추진하는 역할을 하였다. 중국은 광활하며 지역마다 발전이 불균형하여, 이 광대한 영역 내의 남북과 동서 문화교류가 통일된 국가를 굳건히 하는 것이 매우 중요한데, 불교는 국내에서 교류할 때도 마찬가지로 매우 중요한 역할을 하였다. 이상의 양 방면의 역할은 정권이 나뉘거나 세력이 분열되는 상황에서 더욱 두드러졌다.

중국 불교의 전성기는 東晉十六國 시기에 들어서면서이다. 서진(西晉)이 멸망한 후에 “사씨의 다섯 왕이 장강 남쪽으로 수도를 옮기고(伍馬渡江)” 북방은 소수민족 세력이 분열되고 분쟁되는 상황의 “오호십육국(伍胡十六國)”으로 접어든다. 흉노(匈奴), 갈(羯), 선비(鮮卑), 저(氏), 강(羌)과 같은 본래 북방 지역에서 활약하는 유목민족이 약탈하고 정복하여 정권을 세웠다. 그들은 중원으로 남하한 뒤 불교를 접하고 “부처는 서융(西戎)의 신이므로 마땅히 모셔야 한다.

(佛土戎神, 正所應奉)²⁸⁾”라고 하며 불교에 친근감을 가졌다. 그들은 불교를 수용하면서 실제로는 중원의 선진문화를 단계적으로 받아들여 그들의 문화 수준을 높였으며 중화민족의 일원으로 융화되었다. 통일 번영한 당나라는 중국 역사상 가장 번성한 시기이며 각 민족과 국제적인 교류 역시 가장 발달된 시기였다. 불교는 교류하는 데 매우 중요한 역할을 하셨다. 현장(玄奘)이 서쪽으로 구법여행을 하면서, 서역 각국과 인도를 돌며 당(唐)의 명성과 위엄을 드날리고, 중원의 문화를 소개한 것은 역사상 유명한 사건이다. 당나라와 주변 제국(동북의 발해와 북방의 위구르족, 서남의 토번)의 교류는 각기 다른 정도의 한전불교(漢傳佛教)를 받아들였으며 불교는 양방의 교류의 매개체가 되었다. 특히 장족(藏族)은 기원전 7세기 중엽에 불교를 수용했는데 민족의 본바탕에 “장전불교(藏傳佛教)”를 형성하여 삼대불교 계통 중 하나가 되었다. 7세기에 송찬간포(松贊幹布) 왕은 문성공주(文成公主)를 아내로 맞이하며 한전불교(漢傳佛教)를 수용하고, 불교 발전을 한걸음 더 촉진하였으며, 중원(中原)과의 관계 역시 밀접해졌다. 이후 한전불교(漢傳佛教)와 장전불교(藏傳佛教)의 교류는 끊이지 않았으며, 서로 크나큰 영향을 주고받았다. 또 다른 역사 시기는 송원(宋元) 시기이다. 요 나라의 거란족 발상이 시작되면서, 남방 한족의 선진문화를 받아들이던 시기에 그 중요한 내용의 하나가 바로 불교였다. 요 나라 태종(太宗) 會同元年(937)에 이르러 연운(燕雲)16주를 쟁취하면서 바로 불교가 번성하는 지역이 되었고, 정부와 민간 불교 신앙의 번영을 더욱 촉진하였다. 금나라를 세운 여진족은 개국 이전에 고려와 발해로부터 불교를 수용했다. 이후 남하하여 요

28) 《高僧傳》卷九《晉鄴中竺佛圖澄傳》，第372頁

나라를 멸망시키고 요 나라의 숭불 문화를 완전히 계승하였다.(변경을 점령한 이후 또 송나라 불교의 영향을 받았다.) 몽고족은 칭기스칸 정복 시기에 불교를 이미 수용하였다. 칭기스칸은 외래에서 전래되어 온 각종 종교들에 동등한 대우를 해주어 도량이 넓음을 과시하였다. 세조 쿠빌라이(忽必烈)가 즉위하기 전에 티베트의 승려 파스파를 초청하여 황군을 위해 기도하도록 하였고, 전국 불교를 관리하도록 하였다. 원나라 초기에 티베트는 결국 중국 영역에 포함되었는데, 바로 샤카파의 활동에서 힘을 얻었다. 청 왕조에서는 만주족이 전국의 정권을 세우고 통치를 하는데 있어 불교는 민족을 융합하고 단결하는데 매우 긍정적인 역할을 하였다. 청 왕조는 전면으로 한전불교(漢傳佛教)와 장전불교(藏傳佛教, 喇嘛教)를 수용하고 지지하였는데 의식적으로 각 민족을 단결하고 교화하는 수단으로 이용했다.

중국 불교는 주변 국가와 민족의 문화적 교류에 중요한 내용이 되었고, 주변의 각 나라와 민족의 우호 관계를 맺는데 중요한 매개체가 되었다. 중국 불교는 삼한, 일본, 베트남에 전파되어 뿌리를 내렸고, 특히 “한자문화권”이 형성되고 발전하는데 중대한 역할을 하였으며 지금까지 각 나라와 민족의 우호, 평화, 상호이익, 합작의 중요한 저력이 되고 있다.

이와 같이 전혀 과장하지 않고 말하면, 불교는 대대적으로 중화민족문화의 건설과 발전을 촉진하였고 인도와 중국 양국의 위대한 전통 문화의 교류와 결합으로 중국불교의 찬란한 결실을 이루었으며, 인도불교문화는 성공적으로 중국 문화 가운데로 융합되어 중국문화의 중요 구성 부분이 되었다. 이런 유구한 문화 교류사는 오늘의 우리에게 무궁한 계발과 연상, 경험과 참고가 되어주었다. 그리고 이러한 것들은 불교문화의 현대적 의의의 주요 소재이다.

